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对革命理念的阐发*

——以伦敦《晨邮报》所见孙中山佚文为中心

李 珊

[摘要] 1898年7月，伦敦《晨邮报》发表了两篇由孙中山和柯林斯合作完成的文章——《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及《兴中会的目标》。在两篇文章中，前者着重介绍了由地方士绅领导的乡勇，以此展现蕴含在广大汉族民众中的潜在军事实力；后者澄清了所谓中国人“排外”、封闭等西人对华错误认知，阐发了兴中会学习西方、开放中国市场等政治主张。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与其时流传的孙中山领导广西会党起义的谣言密切相关，《晨邮报》亦借机发表社论，主张英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连同此前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司法改革》二文，在四篇与柯林斯合作完成的文章中，孙中山通过英国媒体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因与目标、潜力与愿景，是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孙中山 伦敦蒙难 英文撰述 柯林斯 兴中会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5)03-0077-15

中外学术界对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孙中山如何进入中国驻英国公使馆的史实考订，对于孙中山在英国期间的活动亦有较细致的梳理。^①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中国人的对外言说研究”（项目号24BZS1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研究人员。北京 100101

① 主要包括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美]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以及[澳]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等。新近研究认为，孙中山是在知晓“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的前提下有预谋地“自投”使馆，目的在于扩大革命影响，引起西方各国舆论的同情。参见侯中军：《“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安东强考察了“伦敦蒙难”事件后孙中山海外形象的自塑与他塑，指出西人将其视作变法维新党的看法反向影响了国内知识界的认知，维新派更是警惕地编刊《中山樵传》以示与孙中山的区别。参见安东强：《戊戌前后孙中山政治形象的棱镜效应》，《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

是，对于孙中山从使馆获释后到1897年7月离开英国之前在友人帮助下所进行的英语撰述活动，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①2021年，笔者曾发表文章考察孙中山与其老师康德黎合作的《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及与柯林斯(Edwin H. Collins)合署的文章《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下文略作《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司法改革》(“Judicial Reform in China”)二文的写作动机、内容主旨及舆论反响。^②由于篇幅所限，该文未能论及1898年7月18日、22日孙中山与柯林斯在伦敦《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中发表的两篇英语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以及《兴中会的目标》(“New China Party’s Aims”)。除英国学者安德森发掘出这两篇文章外^③，目前学术界对这两篇文章的了解相对有限。安德森的研究对

① 李云汉最早提出应当充分重视孙中山撰写的英文著作(李云汉：《研究中山先生的英文史料》，收录于黄季陆等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第377页)，但是国内外关于孙中山的英文著述专门研究并不多见。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安德森(Patrick Anderson)的著作《孙中山和埃德温·柯林斯佚失的著作》(*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对“伦敦蒙难”时期孙中山与柯林斯合作进行英文撰述的历史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蔡新乐：《历史文献翻译的原则性追求：孙中山著〈伦敦绑架案〉的解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不同译本的“Kidnapped in China”进行了批判性研究。陈英程的论文《孙中山革命宣传的起源：传播、表演视角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3期)将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起源及其宣传实践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中进行考察，认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和宣传活动是移植西方现代性，尤其是对民主政治的模仿、表演的媒介化过程。徐涛考证了孙中山以中英文交织的形式撰著并发表《实业计划》的复杂过程(徐涛：《〈实业计划〉成书考》，《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② Li Shan, “Sun Yat-sen’s English Writing and Revolutionary Image after His Kidnapping and Imprisonment in Lond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15, No.2, 2021.

③ 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p.128-134. 两篇文章的全文附于书后的附录4、附录5。安德森还发掘到1897年4月在《婴儿：母亲的杂志》(*Baby: The Mother’s Magazine*)中发表的《中国孩子是如何被养育的：对孙逸仙医生的专访》(Chinese Children: How They Are Reared: Special Interview with Dr. Sun Yat Sen)一文。黄彦先生主编的《孙文全集》第十一册谈话(上)中收录有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养育方式》的文献，实际上，这篇文章就是当时英国报纸对《中国孩子是如何被养育的》一文的摘编。参见《中国人的养育方式》(英译中，1897年4月17日刊载)，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十一册谈话(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2—33页，英文原文在第504—506页。严格说来，这篇文章应属安德森对于孙中山的访谈。此外，安德森认为1898年7月23日发表于周刊《发言者》(*The Speaker*)的《中国的改良运动》(*The Movement for Reform in China*)(*The Speaker: A Review of Politics, Letters, Science and the Arts*, Jul. 23, 1898, pp.103-104.)一文亦出自孙中山与柯林斯的合作。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鼓吹改良主义思想的情况。作者提出：“当前，本土报刊的影响力最鲜明地体现在教育的改革方面。所有的改良派成员都一致谴责现行制度，并且都认同教育改革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作者还主张通过舆论宣传和教育的改革来唤起不满足于清政府统治现状的士大夫阶层，并且对光绪颁布的变法举措抱有希望。此外，文章还提到维新派托名欧洲人或日本人在上海创办报刊等细节。综合来看，这篇文章似乎是支持维新派的来华西人所作。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阅读当期《发言者》发现，其中介绍了柯乐洪(Archibald R. Colquhoun)新出版的著作《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这本书的第五章正是介绍中国国内的报刊情况，其中涉及较多关于新式报刊出版、发行及其主张的介绍，内容与《中国的改良运动》相近。

于了解柯林斯的生平^①及其与孙中山交往合作的细节很有价值，但是他对这两篇新见孙中山佚文，仅基于自己的阅读感受作了简单介绍，缺乏对文本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有鉴于此，笔者试图结合当时的中外历史语境解析两篇文章的内容，考察两篇文章的写作及发表背景，并将它们置于孙中山早期著述及思想脉络中，探究其主旨及历史意义，就教于方家。

一、1898年前后《晨邮报》中的孙中山

《晨邮报》是在英国伦敦发行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日报。1772年，由约翰·贝尔（John Bell）和友人一起创办，他被认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三位报人之一，1786年贝尔离开该报创办自己的报刊。《晨邮报》一度因触犯诽谤法被罚导致销路不畅，1795年卖给三大报人之一的丹尼尔·斯图亚特（Daniel Stuart），他坚持独立办报方针，并充分发挥广告的作用。^②《晨邮报》以刊载贵族、富豪们的消息及文学艺术文章闻名，并被认为是伦敦第一份定期登载戏剧、音乐会讯息的日报。该报支持进取性的外交政策，19世纪末《晨邮报》有关军事的文章开始受到读者关注。^③1899年末，丘吉尔曾作为《晨邮报》的记者前往南非报道布尔战争并一度被俘。^④1937年，该报被《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收购。

与伦敦的大多数报纸一样，《晨邮报》中最早出现有关孙中山的消息始自“伦敦蒙难”事件。1896年10月24日，即孙中山从伦敦获释后的第二天，《晨邮报》以《中国大使馆的逮捕：犯人获释》为题作了报道，文章的另一个副标题是“引人注目的故事”，这则消息篇幅不短，占据了该报第3版7栏内容中的近2栏，消息主要来自英国国家通讯社（the Press Association）。文章叙述了孙中山于10月23日下午5时被中国大使馆释放的情形以及记者对两位当事人孙中山、马格里的采访实录。此外，文章还附上了10月23日《地球报》（*The Globe*）刊登的康德黎有关自己和孙中山的关系的说明。^⑤这些报道与当时伦敦新闻界对此事件的报道基本一致。1897年2月27日，《晨邮报》再次登载了一则关于孙中山的消息，即“《伦敦被难记》的作者孙逸仙医生和康德黎先生将于3月11日晚8点15分在圣马丁会议厅（St. Martin's Town Hall）发表演讲，演讲将辅以幻灯片和中国的珍稀物件（Chinese curios）作为展示”。该消息还说明：“演讲的收益将捐给目前正在为查令十字医院募集的10万英镑特别基金”。^⑥1898年1月11日，《晨邮报》以“孙逸仙案”为题，刊登了摩根（Rowland J. Mulkern）以“中国之友会”（Friend of China Society）荣誉秘书的名义致该报的

① 黄宇和曾指出，柯林斯是“英以色列”信徒（British Israelite）。参见黄宇和：《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第247页。安德森则对其生平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发掘出更多信息：柯林斯1858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裔犹太人家庭，曾被授予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霍利尔希伯来学者的称号，并在马尔堡大学及巴黎求学，掌握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多门语言。他早年是一名希伯来学者和犹太教牧师，也曾担任过记者。参见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p.60-61.

② 郑超然等著：《外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③ A. W. Ward and A. R. Wal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 Encyclopaedia in Eighteen Volumes (1907-21)*, Vol. XIV, The Victorian Age, Part Two, <https://www.bartleby.com/lit-hub/volume-xiv-english-the-victorian-age-part-two-the-nineteenth-century-iii/9-the-stuarts-and-the-morning-post/>, 最后查询日期：2025年5月12日。

④ [英] 诺曼·罗斯：《丘吉尔传》，李家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⑤ “The Arrest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Release of the Prisoner,” *The Morning Post*, Oct. 24, 1896, p.3, col.1-2.

⑥ *The Morning Post*, Feb. 27, 1897, p.7, col.5. 《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The Daily Chronicle*, Feb.27, 1897, p.3, col.5.）

信，信中对港英政府以五年为期驱逐孙中山一事提出抗议。^①为了引起舆论关注，当日摩根亦向伦敦的《标准报》(Standard)和《晚报》(The Evening News)等多家报纸发出了内容相同的投书。^②可以说，在1898年7月之前，《晨邮报》所刊载的孙中山消息基本与当时伦敦各大报纸对孙中山的关注“同频”。

1898年7月，《晨邮报》独家刊载了孙中山和柯林斯完成的两篇文章：18日，在第5版“中国的造反”(The Revolts in China)栏目下刊登《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一文，22日又在第3版“中国的叛乱”(The Chinese Rebellion)的大标题之下刊载《兴中会的目标》(New China Party's Aims)^③一文。在这两篇文章前，均有按语：“下文由孙逸仙医生与埃德温·柯林斯先生一起撰写(in conjunction with)，据报道孙是目前的叛乱的领导者之一，柯林斯先生将本文提供给《晨邮报》。”^④

7月18日的《晨邮报》中，在大标题“中国的造反”之下，另有两个小标题，分别是“广西暴动蔓延”和“上海的法国人纠纷”，小标题下方有“路透社电报”的字样。紧接着便是与两个小标题相关的内容。首先是一则7月16日路透社发自香港的消息，内容是“‘新中国’党(New China Party)正在从世界各地聚集起来，以期襄助广西省的叛乱。据报道，一个由受到西方思想灌输(imbued with)的汉人组成的新政府将建立起来，据称英国和日本已对其予以支持。”^⑤这则新闻的背景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会党首领李立廷(一作李立亭)聚集二十余万之众在广西发动起义，陆川、北流、博白、容县等地相继被攻陷，玉林、博白被围，两广震动。^⑥在这则消息之后是两则路透社发自上海的消息，内容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这些新闻均刊登在《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一文之前。

很难说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出于孙中山本人的意愿。“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寓居英伦近一年时间。由于“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他“不欲久处欧洲，旷革命之时日”^⑦，故而于1897年7月离开英国，经北美前往日本。1897年7月11日，孙中山乘坐“努美丁”号(Numidian)号

① Rowland Mulhern, "The Case of Sun-Yat-Sen," *The Morning Post*, Jan. 11, 1898, p.3, col.2.

②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28, note 103; Rowland Mulhern, "Sun Yat Sen," *The Globe*, Jan.11, 1898, p.6, col.3; "Sun Yat Sen: He Has Been Banished from Hong Kong," *The Evening News*, Jan,11, 1898, p.3, col.2.

③ 这篇文章的题目直译应为“新中国党的目标”，但笔者认为从文章内容主旨出发，此处的“New China Party”可以翻译为“兴中会”。“新”与“兴”这两个字汉语发音接近，从意思上讲，将“兴中会”翻译为“新中国党”似乎也勉强说得通。笔者猜测，或许孙中山在向柯林斯介绍“兴中会”这一组织时，曾意译作“New China Party”。安德森将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中国的叛乱》(The Chinese Rebellion) (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129及附录5)，但是笔者查阅报纸原文后认为，从报纸的排版、文章内容及标题字体大小的差异来看，“中国的叛乱”应是《晨邮报》在编辑报纸时所加的大标题，性质与7月18日在《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一文之前所列出的“The Revolts in China”类似，因而将“中国的叛乱”作为孙中山这篇文章的标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④ 两篇按语只有两处不同，7月18日的按语为“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present insurrection”，22日的按语则为“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Rebellion in China”，18日的按语更加强调“叛乱”正在进行中。

⑤ "Kwang Outbreak Spreading,"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1.

⑥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0年，第18—20页。

⑦ 孙中山：《孙文学说》，上海：华国印书局，1919年，第138页。

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又于8月2日乘“印度皇后”号（Empress of India）赴横滨。^①1898年夏，孙中山、陈少白正在日本与井手三郎、宫崎寅藏、平山周、中西正树等人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借维新运动之机，加紧革命行动。^②换句话说，这两篇文章见报时，孙中山已经离开英国近一年时间，文章的投稿与发表极有可能是柯林斯一人所为。

二、展示潜在的革命力量：《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

《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开篇写道：“在中国的下一届武科考试中将不再使用弓箭，似乎令英国公众大吃一惊。但是在欧洲，没有人对中国军队的真实情况有丝毫概念。”^③1898年3月，光绪帝采纳荣禄等人有关开设武备特科的奏议，下改革武科旧制的谕旨，规定：“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科试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④其时，孙中山远在日本，这句话很有可能是柯林斯或《晨邮报》编辑为了吸引读者而自行加入文中的。

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军队的构成：“中国的军队包含鞑靼驻防军（Tartar Garrisons）、所谓的常备军（Standing Army）以及义勇兵（the Volunteers）。”其中，第一种，鞑靼驻防（Tartar Garrisons），“或称八旗（the Eight Banners）驻扎于北京、满洲和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一些较重要的城市，防止叛乱。”第二种，常备军（Standing Army），即绿营，他们“本应在为皇帝而战时首当其冲，但他们的薪俸如此低微，以致士兵几乎无法依靠薪水维持生计”。

接着，这篇文章指出驻防八旗和绿营的种种弊端。其中抨击八旗最力：“他们的薪俸比常备军高，职责却仅仅是守卫他们所戍卫的满城，很少参与战场的战斗。他们是汉人（the native Chinese）的死敌，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他们”。绿营的问题则是腐败孳生，“即便是应发给士兵的微薄的薪水，也落入了官员的腰包，再也不会吐出来”。官员虚报兵额，“吃空饷”的情况非常普遍。“军队只存在于纸面上，而不是有血肉之躯的人”，因为官员们形成某种提供兵源的承包制公司，垄断征兵权，实际所征召的士兵数目不超过领取军饷人数的75%，有的地区甚至低至25%。“到了阅兵的日子便雇佣短工，按天或周发给他们工钱，让他们假扮士兵，阅兵结束后立马解散”。^⑤孙中山还指出，即便那些身份真实的士兵，官员们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将他们饷银中的四分之三扣留下来，并且还从供应的被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赚取大量利润。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介绍清朝的第三种军事力量——“义勇兵”。正文分为三部分加以阐述，分别是“作为‘勇’的义勇兵”“汉人与军事素养”“在满大人的统治下”。在第一部分中，孙中山介绍到：“义勇兵主要由来自乡村地区的人们组成，地方士绅领导。正如不久前的中日战争那样，一旦真正的战争打响，他们便被征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孙中山表示，义勇兵战斗力强劲，尽管义勇兵的训练和管理不像八旗军那样正规，但是他们是“唯一一支能够与欧洲士兵面对面的军队”。以广州和上海两城为例，“在义勇兵被调开后，英国人豪不费

① 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第80页。

② 桑兵主编，於梅舫、陈欣著：《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1866.11—1905.12），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6页。

③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1.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⑤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1.

力地占领了它们”。孙中山介绍称，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义勇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义勇兵失败了，北京必定落入太平军的手中。由于政府发现义勇军（the Volunteer Force）如此有力，便以‘勇’（Braves）之名将他们编入常规军的一支”。而后，在左宗棠平定新疆、中法战争的谅山大捷等军事行动中，勇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这里的“义勇兵”指的应当是乡勇。乡勇，或称乡兵。《清史稿》载：“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嘉庆间，平川、楚教匪，乡兵之功始著。道光之季，粤西寇起，各省举办新团练，有驻守地方者，有随营征勦者。侍郎曾国藩以衡、湘团练讨寇，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卒平巨寇，其始皆乡兵也。”^②清前期，“乡勇”是指出于维护地方治安需要而组建的团练最基本组成成员，亦称“团勇”“练勇”“团丁”“民壮”等，性质上不属于经制之“兵”，乡勇由地方士绅领导，但受到官府节制。^③清代中后期开始，八旗、绿营废弛，清军多募勇辅助作战，“事平旋撤”，直至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以戚继光、傅鼐之法训练湘军，勇营制度正式确立。^④严格说来，团练与勇营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勇则应分为乡勇与募勇二种，但是这只是在理论上清楚界限，实际运作中的团练与勇营不免彼此混淆。^⑤孙中山也并未严格区分团练与勇营，但从被征调赴外地作战这点看应当主要指后者。

孙中山认为，与积弊重重的八旗和绿营不同，乡勇是汉族人优良军事素养的代表。在第二部分“汉人与军事素养”中，他写道：“乡勇以耐心、毅力和忠诚闻名，在各个方面都比绿营或驻防八旗更有声誉，后者与劫掠的土匪无异，对于驻扎地的居民来说，他们比敌人更难对付。”不过，他指出乡勇只有在赋闲在乡的士绅和学者的领导下，才会坚守阵地，一旦由官府率领，乡勇们也会变得“不足为恃”，因为他们往往会“被拖欠薪饷、遭受苛待”。孙中山写道：“诚如吴士礼爵士所说，汉人具备所有的军事素养。”他认为，尽管这句话非常正确，但前提是“汉族士兵的训练得当、装备精良、薪水优厚、待遇上佳”，而“在现在的统治之下，这些都无从谈起”。^⑥勇营战斗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与“兵为将有”的组织形式有很大关系。

在这里，孙中山引用了英国陆军元帅吴士礼（Lord Wolseley）^⑦对汉族士兵军事素养的评价。此言确有出处：1890年9月在吴士礼即将由英国陆军副总司令转任爱尔兰陆军总司令时，英国著名记者斯特德（W. T. Stead）创办的刊物《评论之评论》（*The Review of Reviews*）对他进行人物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吴士礼提醒英国重视中国人的军事潜力，并预言“中国将在未来成为强国”，

^①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1.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一百三十三，志一百八，兵四，乡兵，第三九四九页。

^③ 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 罗尔纲：《湘军新志》，《民国丛书》第5编（31），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第84—85页。

^⑤ 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第10页。例如广东的安勇就因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广东绅民募为团练勇。刘青峰：《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66页。

^⑥ 以上引文均出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1.

^⑦ 吴士礼（Garr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1857年随英军来华，中途转赴印度。1860年为英国海军司令何伯（Sir James Hope, 1808-1875）的副军需官，随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归国后著有《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其后历任英属非洲各殖民地军政要职、陆军元帅、英军总司令，获封子爵。

他的原话正是：“由于汉族军队具备所有的军事素养，他们视死如归、忍耐力非凡，俄国人将会败于他们面前。然后，汉族军队将会向西征伐。”因此，他认为，英国应当“绷紧神经、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①

孙中山是如何得知吴士礼的这一说法呢？在1897年3月发表于《双周论坛》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结尾处，孙中山表明自己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向英国人民证明，“让我们成功是符合整个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利益的，那种时常被推崇的所谓保护现政府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本刊8月号中“L.”即是一例）。那位作者说，在每一次攻击中，英国都应当保护现政府，无论攻击是来自本土的还是外部的。”^②这里所说的署名“L.”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未来》，刊登于1896年8月的《双周论坛》。在《中国的未来》一文中，作者“L.”谈到在中国建设铁路的必要性时写道：“在国内交通的现状下，中国市场就像吴士礼爵士口中的中国军队，仅仅是一种潜力。”^③吴相湘认为，此文作者很有可能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L.”则是其中文姓名的第一个字的罗马字拼音简写。^④“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曾与休假回国的李提摩太会面。^⑤据李提摩太对二人谈话的记述，孙中山首先对他在饥荒救济和文化教育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继而详细向他讲述了满族的专制与腐朽。孙中山明确地表示，中国的出路是推翻满人统治代之以汉族。李提摩太则认为满人统治并非一无是处，仅仅把满人的权力转移给汉人，而不在政府内核上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是丝毫没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⑥或许，孙中山在和李提摩太的谈话中了解到吴士礼对于中国军队的观点，继而又在大英图书馆借阅到1890年的《评论之评论》，因而得以一字不差地引出吴士礼所说的那句话。^⑦

文章的第三部分“在满大人的统治之下”进一步阐述了清朝统治者对地方军事力量的利用与压制。孙中山指出，乡勇是为了满足维持地方治安的需要而建立的。“因为政府没有警察系统，村民们不得不自我保护，他们发现，有必要为此组建一支武装。”但是，清政府则对乡勇严加防范，在数量上和品质上限制其武器装备，只允许他们使用火绳枪和陈旧的武器。清政府只有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征调乡勇，“要么是戍卫省城或重要城市，要么是派往偏远地区的远征”。根据孙中山的观察，由于乡勇们发现“狡猾的官员们总是在欺骗他们”，因此近些年来乡勇作战也不如从前那样有力。在台湾岛和澎湖列岛与日本人短兵相接时，乡勇完全没有展现出中法战争和左宗

① “Lord Wolseley, Character Sketch: September,” *The Review of Reviews*, Vol. II, No.9, (September 1890), p.282.

②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Fortnightly Review*, No.363, News Series, March 1, 1897, p.424.

③ L., “The Future of China,” *Fortnightly Review*, No.356, News Series, Aug. 1, 1896, p.172.

④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台北：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第194页。

⑤ 吴相湘认为二人会面是在1896年11月，黄宇和则根据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做出的判断，孙中山于1897年2月11日前往海外布道团俱乐部探望下榻该处的李提摩太，又根据该俱乐部的客人名录推断18日孙中山再次造访李提摩太甚至留宿。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第188页；黄宇和：《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第152、154、285—286页。

⑥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1916, p.350.

⑦ 安德森在其著作中称这句话是吴士礼的名言，这固然可以解释孙中山和柯林斯对这句话的引用。参见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128. 但是，笔者在互联网搜索后发现，这句话的流传似乎并未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将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以后发表的英文著作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结尾处提到的“L.”和《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中对吴士礼原话的引用之间存在关联，这似乎更符合这一时期孙中山交游、阅读及思考的轨迹。

棠平定新疆时的勇敢和坚毅品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拒绝为政府而战。”他还举例说，当一位钦差大臣被清廷派往湖南，为镇压甘肃的叛乱而招募乡勇时，当地的人们把他赶了出去，而在此之前“人们是愿意效力于他的麾下并把它当作一件荣耀的事”。

尽管与清朝统治者关系紧张，但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勇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孙中山解释道：“中国人通常看不起士兵，把他们看作亡命之徒和危险公敌，而不是光荣的国家卫士；至于士兵，他们毫无顾忌地以各种方式惹事生非。但是，人们对乡勇的看法则不同。作为从村中挑选出来，并得到乡村社群支持的人，他们得到人们的礼遇，他们自己也很自重。”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试图表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众具备优良的军事素质，只是在满族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写道：“只有当汉族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军饷丰厚、待遇优渥的时候，这种优点才能体现出来；在现有的政府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文章的结尾写道：“看起来也许很奇怪，帝国用于自我防卫的资源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有勇气、有精力以及满足必要的智力要求的人很多，并且国家的物质资源也相当丰富。如果按照欧洲的方法组织和训练义勇军，并且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他们将成为优秀的战斗力量。”^①

《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一文的用意并不是介绍中国的军队组织和军事制度，而在于向英国读者展示乡勇这支植根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武装力量。孙中山有意识地将乡勇与八旗、绿营等清政府直接辖制的正规军加以区分，宣扬汉人的军事素养，同时又明确指出只有在汉族士绅的领导下，乡勇才能充分发挥其军事实力。^②此外，孙中山强调乡勇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关联也别有深意。1897年8月，孙中山离英赴日以后，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并与之多次笔谈。从笔谈记录中可知，孙中山曾提到广州起义之际驻守广州的安勇“已有意一起事时即降附我众”。^③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试图向英国读者表明，乡勇可能成为协助兴中会推翻清朝统治的有生力量，从而显示中国革命的潜力。

三、述说革命的愿景：《兴中会的目标》

在《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发表后三天的1898年7月22日，《晨邮报》又刊载了孙中山与柯林斯合作的《兴中会的目标》一文。该文在批评清朝统治者和鼓吹革命上似乎走得更远。这篇文章开篇写道：“在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现状的出版物中，一个重要的点似乎被忽略了：中国的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向英国公众介绍一个中国人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而言，陈述这一事实及其后果即使不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明智的。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根本不是由中国人统治的，而是人数相对少的鞑靼征服者（Tartar conquerors）。满族统治者不仅在民族上与中国人不同，在性格上、原则上和目标上，都与他们仅凭武力和欺诈统治的人们完全不同。”他指出，满族统治者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官僚体系催生了大规模而持续性的腐败。在孙中山看来，“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5, col.2.

^② 安德森基于柯林斯的思想受到卢梭所著《爱弥儿》的影响，指出这篇文章中有关绿营的描述让人联想到卢梭所说的“被教育得既不为己也不为人的堕落腐化的人”，而乡勇们“如果可以除去他们的脚镣，有一天也许会成为为了他们自己的人（汉族）。”参见 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p.128-129。这一解读较为牵强，安德森并未认识到乡勇作为汉族地方武装力量的特殊性，也没能充分理解孙中山一面大力鼓吹乡勇的军事实力，一面揭露乡勇与满族统治者离心离德的深层目的。

^③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1877年9月至1898年8月间），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十一册，谈话（上），第48页。

是不可能摆脱这种扼杀外部贸易、窒碍内在发展的职权滥用的，以至于除非他们将管理全权委托给欧洲官员，否则任何中国政府的退让和承诺都应被视为一种‘装模作样’，了解中国的人对此非常熟悉”。文章还指出，即便是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通商口岸获得的低关税，也被“强制性收取的厘金和被默许的官员勒索抵消了，仅仅深入内地数英里，所有货物的去路也会被拦住去路”。

接下来，文章分为六个小节进行论述，分别是“中国人的性格”“对待外国人”“革新者的宣言”“当今的王朝”“官僚阶层”及“门户开放政策”。

在文章的第一小节“中国人的性格”中，孙中山试图澄清，中国人并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强烈反对外国人和所有外国事物”。他表明，事实上，排外的都是政府而非人民。“对于外国人的入侵或领土的沦丧，满人较为漠视，更令他们害怕的是启蒙精神的传播，这意味着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将被彻底摧毁。相反，汉人担心的仅仅是外国征服和国家沦亡。”孙中山认为，由于百姓被控制在极度无知的状态下，他们“对于地方官员言听计从”，极易被官员散布的所谓“洋鬼子”等诽谤之辞煽惑。一旦发生“杀害欧洲人”的暴行，“官员们很乐意通过处决任何数量的有罪或无故的人，同样地他们也乐意用从百姓那里压榨的钱财进行赔偿”。在他看来，真正能够使地方官付出代价的是“欧洲人向北京施压，迫使某位官员被革职”。

在第二小节“对待外国人”中，孙中山回顾了从明末到清中期统治者对以传教士为首的西方人态度从友好到拒斥的变化。文章指出，欧洲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始自明末，直至清朝初年，统治者都采取优容传教士的政策，利玛窦任职钦天监即为一例。这种情况从禁教政策的颁布开始发生变化，“鞑靼统治者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并且最终将所有的欧洲人驱逐出中国”。他再次重申，普通中国民众对待外国人是友善的，“所有屠杀传教士、烧毁基督教教堂和学校的行为及其他暴行，都是由官僚阶层直接煽动的，并且是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所为。在官方影响较小的乡村百姓中间，对外国人有一种友善的感情，排外情绪只在城市和大型市镇中盛行”。^①这种将满族统治者与中国民众区分开来，并澄清中国人总体上并不排外的表达，是晚清时期具有进步意识的中国人面向西方公众发声时的重要论点。新加坡华人林文庆在其英文著作中也采取这种二分法，并将所有中国和国外的麻烦归咎于满族统治者及上层官僚。^②

文章的第三小节以“革新者的宣言”为题道出了兴中会的对外主张：“‘我们，汉人（the native Chinese），’革新党（the Reform Party）说道：‘渴望向大不列颠和全世界自由地敞开国门，为我们自身的利益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培育（to cultivate it）并开发中国的资源；但是只要鞑靼统治着我们，我们任何事都做不了’”。孙中山还在文中宣称：“中国的革新党旨在引介自由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之下，农业、矿业、工业企业和贸易都将兴盛起来。”孙中山还提示英国读者注意，清廷可能借助外力镇压“革新党”人的运动。“所谓的叛乱，如果不成功的话，无疑将在俄国人的帮助下被由莫斯科军官率领的鞑靼士兵所镇压。也许，正是由于满族人感到在不久的将来会需要这样的援助，面对俄国人侵略的稳步推进，他们才会予以帮助而不是反对，以此作为对这种援助的预支酬劳。”^③1896年，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受到英国朝野的关注，孙中山流亡至英国时正值李鸿章离英后不久，他对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态势在英国引发的普遍担忧自然有所体察。这一时

① 以上材料均引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ew China Party’s Aims,” *The Morning Post*, Jul. 22, 1898, p.3, col.5.

② Wen Ching,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1, p.49.

③ 以上材料均引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ew China Party’s Aims,” *The Morning Post*, Jul. 22, 1898, p.3, col.5.

期，他在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和演讲时，多次提到俄国，并确信中俄密约的存在。^①这无疑体现出孙中山对列强在华角逐态势的敏锐观察，并且善于抓住时事热点进行舆论宣传的特点。

在第四小节“当今的王朝”和第五小节“官僚阶层”中，孙中山着重说明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实行的高压文教政策。“教授和学习地理、本朝历史、法律、科学和军事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唯一被允许研究这些的是那些享受恩荫的有品级的阶层”。这些禁锢思想的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对统治王朝非常忠心，直到你向他们解释，皇帝不是汉人而是鞑靼。通过这一解释，革新党得以在过去的十年中迅速壮大”。在第五小节中，孙中山表明：“统治整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是彻头彻尾自私的，既不忠于皇室（the Reigning House），也没有足够的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发起民众来反抗之。”不但如此，“一旦进入官僚阶层，他便会享有非常多敲诈勒索的特权，以至于他和政府在保持民众普遍无知上同流合污，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和唯一的通过公职获得财富的门路——即‘压榨’和贿赂。”^②孙中山将满族统治者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方法总结为四点：“1.始则消灭所有读书人；2.将民众囚禁在绝对无知的枷锁中；3.以无限的特权和权力俘获进入仕途的人；4.确立皇权神授、百姓必须臣服于‘天子’的观念。”^③

乙未广州起义前，香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记者黎德和《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记者邓勤曾在两报撰文批评清政府的统治，为酝酿中的广州起义鼓噪舆论。^④在1898年3月18日《德臣西报》的社论中指出，清朝官僚阶层缺乏真正的教育，选拔官员的办法也极不合理。“能够就经典写作一篇典雅文章的人，做文官再合适不过；能举起一块巨石、一把战斧，或是能漂亮地释放几支弓箭的人则适合做军事统帅。然而，这些都是无用的考试，人们相信这是满族人防备普通百姓获得有用的知识进而威胁朝廷的狡猾办法。”^⑤不难看出，《兴中会的目标》中有关清朝统治者通过科举教育禁锢民众思想的观点与这段话遥相呼应。

但是，孙中山指出，尽管满族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已经腐朽不堪，但是列强试图以这种方式统治中国或是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统治中国人民。他带有警告语气地表示：“中国人永远不会再屈服于任何外国统治，除非在刀剑之下；然而以现在中国军队的状态，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以少量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地征服整个国家，军队一旦撤退，便会是征服者民族的文职人员被屠杀的信号。”

在《兴中会的目标》的最后一小节“‘门户开放’政策”中，孙中山再次表明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表达的观点：“很显然革新党的第一目标是与大不列颠所宣称的政策相符合的，那就是确保中国不被征服或瓜分。另一方面，如果革新党成功地将中国从满族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这个国家会马上以现在毫无可能的条件放开对外贸易。”除此以外，革新党还将引入外国顾问，“它将保持整个国家的中国性，但是它的所有政府部门都会欢迎欧洲人的帮助，可以是英国人”。^⑥孙中山虽然展现了兴中会与外国友好交往、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但也同时表明这样做的前提是保

① 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p.131-132.

② 以上材料均引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ew China Party’s Aims,” *The Morning Post*, Jul. 22, 1898, p.3, col.5.

③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ew China Party’s Aims,” *The Morning Post*, Jul. 22, 1898, p.3, col.6.

④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

⑤ “Editorial”, *The China Mail*, March 18, 1895, p.2, col.6.

⑥ 以上材料均引自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ew China Party’s Aims,” *The Morning Post*, Jul. 22, 1898, p.3, col.6.

证中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关于推翻满族统治者后引入外国顾问的设想，早在广州起义酝酿阶段即已为兴中会提出。上文所提到的《德臣西报》的社论中认为，鉴于对于国家的深刻变革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而官员的贪污渎职之风导致赋税的有效收缴成为问题，因而建议“在类似海关的安排之下将征收内地税的任务交给外国人，直到中国不再需要任何外国的帮助”。^①

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的结尾，孙中山曾写道：“要适当地写出革新党的目的和观点，单单这件事就需一篇专论文章。”^②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兴中会的目标》正是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揭示了满族统治者推行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批评了清朝统治者的对外政策，阐述了兴中会革命成功后将推行对外国开放市场、向西方学习、聘请外国顾问等愿景。

四、《晨邮报》社论：借机呼吁英国采取更积极的对华政策

1898年7月18日，《晨邮报》有关广西起义和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报道并非独家新闻。当日《泰晤士报》也刊载了这两则新闻，关于广西发生叛乱的消息，文字与《晨邮报》的报道完全一致，所注消息来源亦为路透社。^③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报道消息来源则标注为“本报通讯员”，由于是独家新闻的缘故，所以比《晨邮报》的报道更加详细。检视当日英国报界的大小报纸可以发现，得益于路透社构建起的全球新闻网络，7月18日这一天，英国的各大报纸均登载了这两则消息。^④可以说，对于英国的新闻界而言，这两个事件成了当日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消息。

那么，《晨邮报》为什么在7月18日、22日连续刊载两篇孙中山与柯林斯合作的文章呢？较为直接的解释是，《晨邮报》将孙中山视作广西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当日报纸的导读写道：“据说‘新中国党’（New China Party）的成员正从世界各地赶往中国南方集结，以便襄助广西省的叛乱。我们刊登了一篇孙逸仙医生所作的，关于中国军队的文章，据说他是叛乱的领导者之一。”^⑤7月19日《晨邮报》刊登了一篇通讯员文章，介绍广西起义军的构成，再次将起义的领袖指向孙中山。文中称据可靠消息，“广西的叛军包括黑旗军、三合会和安南人”。通讯员推测领导黑旗军的应当不是年事已高的刘永福。“但是，要在眼下试图推翻两广衙门的叛军中找到一名领袖并不难。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已经找到了一位领袖，即‘医生’孙中山，他被囚禁在伦敦中国使馆的事在不久前还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预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情况将更加复杂，因为就像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一样，孙中山在香港长大，接受了英国式的教育。”^⑥

^① “Editorial”, *The China Mail*, March 18, 1895, p.2, col.7. 安德森也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引入外国顾问是可能是受到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影响，但是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意图是将中国的整个治理体系和法律“外包”给欧洲，这显然与孙中山强调的“保持整个国家的中国性”不符。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130.

^②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6页。

^③ “Latest Intelligence: China,” *The Times*, Jul. 18, 1898, p.7, col.4

^④ “The Unrest in China,” *The Daily News*, Jul. 18, 1898, p.5, col.7; “China,” *The Mail*, Jul. 18, 1898, p.2, col.4. “Another Revolt in China,” *The Morning Leader*, Jul. 18, 1898, p.7, col.3.

^⑤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4, col.4.

^⑥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bels,” *The Morning Post*, Jul. 19, 1898, p.7, col.2. 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显然不够了解。

检视1898年7月18日前后的多种英国报纸不难发现,当时的英国新闻界对于广西起义的实际情形了解并不多,许多报道都存在猜测成分,亦将孙逸仙视作起义的领导者。《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在报道起义时所用的新闻标题是《黑旗军的叛乱》(*Revolt of Black Flags*)。①《曼彻斯特信使报》(*The Manchester Courier*) 亦将这场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当前的运动可以追溯自不久前和日本进行的耻辱之战,而他的领导人之一据说是此前被中国驻伦敦使馆绑架而引发极大关注的孙逸仙医生。”②美国的报纸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消息。③

与英美的情形不同,当时中国的报纸中关于两广会党起义的消息中并未出现孙中山的名字。④最先将起义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是清廷的上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1898年8月26日),由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奏称“广西匪徒闻系孙文党羽,匪首李立亭出安民伪示。洋报内载,孙文办理转运,暗中主谋,集股购械,分股窜扰。请飭查明,亟为备御。”编修张星吉亦上条陈称:“现在大股盘踞西山,军械火药,均系孙文接济。”⑤清廷下发谕旨命两广总督谭钟麟等确查孙文踪迹,缉拿广西叛乱的头目。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可知,1898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匿居澳门的兴中会会员邓荫南与尤列、宋居仁等前往响应起义,但抵达藤县时,李立亭已溃逃。⑥除此以外,孙中山及兴中会与广西起义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孙中山参与领导广西起义的传言,源自哪里呢?黄桂鋆奏折中提到的“洋报”提示了线索。1898年7月14日,香港《士蔑西报》刊登了一则该报通讯员由广州发来的消息,内称:“此地传闻,四年前在本省肇端但旋即失败的叛乱中的关键人物孙逸仙医生是现在这场叛乱的‘精神领袖’之一;他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以购买武器和弹药,并且现在正在广西,指挥着起义军抵御梧州方面的军事行动。”⑦这则报道的内容与黄桂鋆奏折中所言几乎吻合,7月25日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也转载了《士蔑西报》的这则消息。⑧《士蔑西报》的主笔正是1895年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之际在报纸中进行舆论宣传的英国记者邓勤。⑨《士蔑西报》放出这则消息,是否是邓勤借广西起义之机会为了给处于沉寂中的兴中会鼓噪声势而有意为之,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但是,从时间先后上看,黄桂鋆据以奏报清廷的情报和英国报界将孙中山视为广西叛乱的领导者的报道很可能均源于《士蔑西报》。

《晨邮报》接连登载孙中山的两篇文章,与孙中山参与广西起义的传言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该报试图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1898年7月18日,也就是《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刊出的同一日,该报发表社论称:“鉴于议会会期渐近尾声,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他的同

① “Revolt of Black Flags,” *The Daily Telegraph*, Jul. 18, 1898, p.7, col.4.

② *The Manchester Courier*, Jul. 18, 1898, p.6, col.2.

③ “For a Free China,” *Washington Times*, Jul. 16, 1898, p.2. 转引自陈英程:《从“和平宣传”到孙逸仙“伦敦被难”：兴中会与清廷使节的舆论斗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第75页。

④ 笔者翻阅了1898年6月至8月的《申报》，发现有关粤西“匪乱”的报道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得较为频繁，但似乎并没有提到孙中山的内容。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第319页。

⑥ 《邓荫南事略》，《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43页。

⑦ “The Rebellion in South China,” *The Hongkong Telegraph*, Jul. 14, 1898, p.3.

⑧ “The Rebellion in Kuangsi,”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LXI, No.1616, Jul. 25, 1898, p.174. 这则转载的消息只是这个报道的一小部分，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介绍据说是起义军首领的 Hou Chêng Tai 的活动及其与太平军的关系。

⑨ “Old Hongkong: The Early Newspaper (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4, 1934, p.18.

事们可能会有更多闲暇来思考未来几年国家必须遵循的路线……在国际领域最为紧要的便是中国和远东的问题。”原因在于，“中国南方复活并蔓延开来的叛乱对中国皇帝造成威胁，其区域正是英国人的利益和英国人的企图心集中的地方”。这篇社论提出，面对这种情形，英国政府需要考量一大一小两个问题：小问题是如何利用此次叛乱增加英国在中国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力；大问题则是如何保证英国所采取的政策能够被列强接受。就小问题而言，在该报主笔看来，这场起义给英国提供了机会，在清政府明确同意“对英国贸易敞开大门和给予英国铁路建筑者所需的担保”的前提下，英国政府应该派兵帮助清廷镇压起义。^①至于大问题，社论再次重申该报的立场，即英国最应该和德国合作。

《晨邮报》在这篇社论中所主张的英德联合在当时的英国舆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竞相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英国也不甘落后，在华南、长江流域上游乃至山西、河南等地疯狂攫取开矿、筑路等权益。鉴于法国在云南和广西获得了通商、开矿、修筑铁路等权利，威胁到英国在华南的侵略利益，英国商会联合会和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积极倡导英国与德国结盟，对抗俄国和法国在中国的势力，但并未得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的支持。^②广西起义爆发之际正是英法对中国西南和华南的控制权争夺白热化之时，英国对于法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极为敏感。起义爆发后，英国以保护英侨为由派出军舰“花呢号”（Tweed）开往梧州，该舰搜集到的情报将法国视作广西叛乱的背后主谋，认为是法国人故意挑起或煽动叛乱，待事态发展后又提出派兵干涉，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也是法国人故意制造事端，并且法国在中国的种种行动得到俄国的配合。^③可以说，广西的起义使得在云南、广西争夺控制权的英法增添了又一层疑忌。7月19日的《晨邮报》转载法国报纸《时报》（*Le Temps*）的文章。《时报》回应了英国报界对法国的批评，辩称称法国外交部对于广西起义的关注和介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④

至于社论中提出的小问题，即英国应当利用广西起义扩大自己在华南的影响力，《晨邮报》同日的另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的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该报主笔看来，当日该报所刊登的几则关于中国的新闻都预示着“在这个广大帝国内某种普遍泛起的躁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广西的叛乱。文章称：“据说它代表着‘新中国党’（a New China Party）的建立，并将伴随着世界各地的中国佬前往援助。它宣称其目标是推翻现在的满人政府，可以预计，它将以‘中国人治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的根本原则建立社会统治，并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所指示的路径向前发展。”文章指出，广西起义显示了中国普遍存在的秘密会社的力量，而在广州所能感受到的对起义的极大同情，则表明中国南方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反满情绪。文章写道：“一篇刊登在其他地方的文章表明驻防八旗相互隔绝，目前的统治取决于汉族的昏睡不醒”。最后，文章大胆地假设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是——‘勇’，即帝国真正能够战斗的力量——被派去对付起义军。如果这两支队伍达成共识呢？推翻了满人的王朝，作为曾把蒙古军队驱赶到地中海边的民族，如果他们推翻了满人的王朝、复兴汉民族的生机并重振军事力量，这将是——不止一

①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4, col.5.

② [英] 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刘存宽、张俊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71、77页。

③ “Mr. Long to Colonel McSwiney”, Jul. 20, 1898, CO129/287, p.349.

④ *The Morning Post*, Jul. 19, 1898, p.7, col.1.

个欧洲大国需要考虑的问题。”^①此言意味着该报主笔将乡勇视为清政府统治机器中的变量，认为如果他们可能与起义军联合起来推翻满族统治。不难看出，这篇社论将前文提到的《广西暴动蔓延》这则时事新闻和孙中山与柯林斯合作撰写的《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兴中会的目标》两篇文章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中国发生大规模反满革命的可能性，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即是革命的领导者，一旦具有战斗力的乡勇倒向革命者，就能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至此，《晨邮报》发表孙中山和柯林斯文章的来龙去脉清晰起来。在推出两篇文章的同时，《晨邮报》趁势发表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此同时，这则传闻回流至内地后又引发清廷再次发布要求追缉孙中山的上谕。不仅如此，此事也引起了英国外交部门及政界的关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录有一份剪报，题为《又是孙逸仙：据说他正在领导中国的叛乱》，剪报上方注明此则新闻出自1898年7月15日的《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②7月18日，议员达维特（Davitt）再次就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事质询殖民地部部长张伯伦：“如果这位中国改革者没有在英国领土上违反英国法律，香港颁布的驱逐令是否将会撤销？”张伯伦答称，“依据当地总督之见，他对殖民地的和平和秩序构成危害”，故而根据《1882年驱逐和有条件赦免法令》（the Banishment and Conditional Pardons Ordinance of 1882）第三节将其驱逐。当达维特提出孙中山本人未能对港英政府的驱逐令进行抗辩的问题时，张伯伦则答称：“我想我曾经在报纸中读到，这位先生现在正在中国领导叛乱。”^③25日，英国外交常务副大臣伯特（Francis Bertie）应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要求致信驻英公使罗丰禄，告知其港英政府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当前仍然有效，并没有任何正式撤回这项命令的申请。^④可以说，一则缺乏事实依据的风闻又将孙中山带回英国公众的视野，而从《晨邮报》的社论和英国下议院的质询中可以看出，英国人中关心远东局势和对华政策的部分人士已将孙中山视作中国内部的变革力量。

结 语

孙中山于1897年3月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与香港《德臣西报》1895年3月12日社论的主旨与论据如出一辙，用词也颇为相近，而1895年3月18日《德臣西报》中提出的改革中国司法制度、废除严刑逼供等主张，也与《中国之司法改革》互相呼应。^⑤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及《兴中会的目标》二文与《德臣西报》的社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均不乏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纳入孙中山的思想与著述脉络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与互文性。1896年12月，孙中山曾向记者表示，自己打算写作两本书。^⑥其中一本自然是出版于1897年1月的《伦敦被难记》，另一本则应当是由柯林斯协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Revolution in China,” *The Morning Post*, Jul. 18, 1898, p.4, col.6.

② “Sun Yat Sen Agian: Said to Be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t” (*Newspaper Clipping*), *The Daily Mail*, Jul. 15, 1898, FO17/1718, p.170.

③ “Commons Sitting of Monday, 18th Jul. 1898,” *19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Sessional Papers*, Four Series, Vol.62, cc.76-77, <https://isvoidrviivzybhubsijstusjzkehwodfbs-s.libvnp.cass.cn/parlipapers/docview/t71.d76.cds4v0062p0-0001?accountid=41097>, 最后查询日期:2025年5月13日。

④ Francis Bertie to Lo Fêng Luh (Draft), Jul. 25, 1898, FO17/1718, pp.172-173.

⑤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41、543页。

⑥ “Concerning Sun Yat Sen,” *The Home News*, Dec. 4, 1896, p.11, col.2.

助孙中山撰写。1897年7月，孙中山和柯林斯合作的《中国之司法改革》在《东亚》杂志发表时，在首页正文下方亦有附注说明“这篇文章可能会成为我们正在一起撰写的一本书的一部分。”^①孙中山与柯林斯的合作从司赖特侦探社对其行踪的记录中也有迹可循。从1896年10月27日孙中山第一次造访柯林斯位于阿尔伯特路（Albert Road，今 Albert Prince Road）12号的家中，直至1897年4月，经常出入柯林斯家，频繁程度甚至超过到访康德黎家的次数^②，且逗留时间从1小时至4、5小时不等。^③可以推测，《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司法改革》《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兴中会的目标》四篇文章正是来自于这本二人本打算合作完成的著作。^④

有学者曾从话语分析的路径出发对孙中山所称的“革命”进行考察，认为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中既有崇拜“汤武革命”的成分，同时又无法突破传统文化中“谋乱”“造反”等概念和意涵的桎梏，并指出在英语语境中孙中山所使用的也是“reform”而不是“revolution”，试图表明对于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存在着基于后世历史经验的过度阐释之嫌。^⑤如若将新见的孙中山在《晨邮报》发表的佚文纳入考察的视野，无疑会有不同的认知。可以说，在柯林斯的帮助下，孙中山以英语为媒介向西方阐述了革命动机、革命目标、革命所依赖的力量及革命愿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兴中会的目标》中，孙中山指出满族统治者“以无限的特权和权力俘获进入仕途的人”，而跻身官僚阶层滥用职权、压榨百姓。联系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所指出的：“其实，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所有一切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饥荒、洪水、瘟疫的主要原因，并且常年横行的武装劫匪和强盗也与之脱不了关系。”^⑥可以说，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满族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形成的权力同构关系，是国家落后、百姓苦难的根源所在。基于此，他提出“革新党”在推翻满族统治之后将在保证国家的“中国性”的前提下吸收外国顾问，向西方学习。这无疑表明兴中会的革命目标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尽管孙中山避免直接使用“革命”这样的字眼，但是从其与柯林斯合作的英文撰述的具体内容看，其所秉持的革命思想应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 李振武 张祥梅]

① Sun Yat Sen and Edwin Collins,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East Asia: A Quarterly Journal of Far Eastern Lore and Literature for the General Reader*, Vol.1, No.1, Jul. 1997, 转引自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二册代表作四种（下）论著（上），第505页。

② 黄宇和：《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第97—99页，第345页表5.1。1897年4月2日以后孙中山很有可能还曾造访过柯林斯家，但由于1897年4月19日至6月23日之间司赖特侦探社与使馆之间的通信不见于现存记录，故无法确证。

③ 例如，1897年11月24日、11月27日、12月2日，1897年1月15日，孙中山在柯林斯家逗留的时间都超过三个小时，参见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第116、117、127页。

④ 安德森在其专著不仅将这四篇文章视为孙中山和柯林斯计划完成的这部著作中的章节，还结合自己的研究为这本“从未完成和出版的著作”拟定了一份目录。参见Patrick Anderson, *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pp.138-139。

⑤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0—115页。此点承蒙小叶研究员提示，谨致谢忱。

⑥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Fortnightly Review*, No.363, News Series, March 1, 1897, p.425.

called a solipsist or a metaphysician or a cultural philosopher. If these scholarly identifications of Wittgenstein are plausible,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ay that Wittgenstein was a logical atomist.

(5) Sun Yat-sen's Elaboration on Revolutionary Ideas after His Imprisonment in London: Focusing on Newly Discovered Sun Yat-sen's Articles in *The Morning Post* of London

Li Shan · 77 ·

In July 1898, the London newspaper *The Morning Post* published two articles co-authored by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 namely, "Chinese Army and Volunteers" and "New China Party's Aims." In these two articles, the former one introduced the local militia led by the local gentry class, which showed the potential military power reserved in the large Chinese population. The latter clarified the false notion held by the westerners towards China, that the Chinese are "anti-foreign" and close-minded, and elaborated on the political propositions of *Xingzhonghui*, including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to open up the Chinese market, etc.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two articles in London pres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rsay that the rebellions carried out by the secret societies in Guangxi was led by Sun Yat-sen. *The Morning Post* also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publish editorials advocating a more positive China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ombined with the articles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and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in the four articles co-authored with Edwin Collins, Sun Yat-sen fully expounded on the motivation and goal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and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constituted literatu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research on Sun Yat-sen's life and thoughts in his early years.

(6)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tellectual Inclina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Yang Dong · 107 ·

Recogniz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rioritized studying Western languages, while seeking pathways forward necessitated proficiency in foreign tongues—this was a foundational consensus among China's modern enlightened intellectuals. Although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engagement with foreign languages stemmed from the curriculum reforms of new-style school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ir linguistic choices and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s in learning and disseminating Marxism reflected distinct practical exigencies and epochal concerns. While language acquisition follows universal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early Communists' foreign language study diverged markedly from societal norms. To them, foreign languages were not merely vessels of thought but also weapons of struggle, framing linguistic competence as an essential quality for revolutionaries to be applied in practical revolutionary endeavors. However, language learning remains a highly subjective mental activity, where individual aptitude inevitably shaped outcomes, thereby revealing the varied proficiency levels among early Communists.

(7) The Left-wing Literary Circles in Hong Kong and the Works & Writers of Liberated Areas (1946-1949)

Xie Lizhe · 157 ·

From 1946 to 1949,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civil War, the left-wing literary circle in Hong